

●周 旂 (中山大学 信息管理系, 广州 510275)

关于姚名达对《七略》的几点否定的思考

【关键词】姚名达;《七略》;分类法

【摘要】针对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对《七略》分类法提出的几点质疑作了思考,并对《七略》分类法的依据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07)02-0079-02

《七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国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它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先秦至西汉时期我国的学术状况,其分类法奠定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图书分类法的基础。也正因为《七略》在我国图书分类法的首创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以及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所以我国历代的目录学家都对刘歆的《七略》赞赏有加。^{[1]16}然而姚名达先生在他的《中国目录学史》中对刘歆的《七略》赞赏之余,却也有颇多否定。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到上海专心写读。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其遗著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7种。姚名达先生生活在一个传统目录学渐始式微,西方目录学广泛引进的年代,其思想深受西方现代目录学学科原理的影响,因此他对中国传统目录学有着深刻的批评。^[2]他的很多见解独到而又精辟,但是他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对《七略》的几点否定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再次深入思考。虽然他对《七略》分类法的批评,以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句句属实,字字在理,但却有以现代人之成就评古人是非的嫌疑。我以为他的批判有些脱离刘歆创建分类法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其批判有失客观,特别是“其法草创,前无所录,原无深意”“后人誉之过其实”的论断实在过于苛刻。我认为姚名达先生的持论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其一,姚名达先生说“《诸子略》既有《阴阳》,《兵书略》又有《阴阳》,种名重复,亦所不嫌”。我认为姚名达先生对两个“阴阳”概念理解不深刻。《诸子略》中的“阴阳”是“诸子百家之阴阳”,这是一个思想流派的名称。“诸子百家”中的各家分别代表不同的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及其利益,他们“各引一段,崇其所善”,以自己的学说游说于诸侯之间,希望能得到诸侯们的赏识与认同,依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社会。说得通俗(但并不一定准确)一些,这里的“阴阳”应当相当于现在的哲

学、政治类书籍。而《兵书略》中的“阴阳”应做“兵阴阳”,是一种自然科学与迷信相糅合,带有很强技术性、实践性的图书。正所谓“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3]古人是很重视战争中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其中天时、地利就是兵阴阳所研究的范围,包括天候、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在分类法中出现同一类名的现象不要说是在古代分类法初创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在现代,图书分类法已成熟的今天也是依然有的。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为例,“林业”这一项就在多处出现过,如F307.2是林业类,S7也是林业类,但是这相同的类名是有不同含义的,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界定,其上位类和下位类都是不同的。即使要批判,我们也只能说刘歆对每一类目缺乏必要而又详细的注释,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是《汉书·艺文志》所做的保留,其原书是否对此有注释说明我们也不知。因此说姚名达先生对种名重复这一点的批评有些考虑不周。

其二,姚名达先生指出“‘阴阳家者流’,既‘盖出于羲和之官’,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与《术数略》之‘天文’‘历谱’无异;而‘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亦与《术数略》之‘五行’‘杂占’无异。然分列于《诸子略》,独不入《术数略》,虽曰虚理有殊与实艺,而强剖一家之学于绝远之域,终属不合分类之原则”。对于这点批判,我觉得也有待斟酌。首先必须澄清概念,考镜源流。诸子之阴阳与天文、历谱、五行等既非虚理与实艺的关系,更谈不上所谓“一家之学”。其实《诸子略》中的“阴阳”全称应是阴阳家,只是如儒家、道家、法家等一样,在诸子略这一大类的小类名称上省略了“家”字,但是在小序中是将“家”补回了的。其中《阴阳》这一类的小序就有“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段小序是对《阴阳》这类书的作者的概述,而非是对书中内容的阐述。所谓阴阳家或阴阳学是古代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心思想的学派,有传说是由天文学家、占星家演变而来。“五行说以土木金火水解释宇宙万物构成,阴阳说以阴阳二气矛盾解释事物变化,为科学与巫术混杂的体系。”^[4]阴阳学家们看待社会与历史是以“舍人事而任鬼神”角度入手的。从以上关于阴阳家的概述上我们可以知道,刘歆设《诸子略》的“阴阳”、《术数略》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占卦”这些小类,而不将其混为一谈,正是体现了一种辨章学术的精神。正如今天的

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都是由古希腊的伦理学发展而来,但是我们依然是将其分别各设大类。姚名达先生谓之“不合分类之原则”,但愚以为分类之原则就是以内容类书。如像姚名达先生所言,将阴阳、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混为一类,则是以人类书,恰是犯了“不合分类之原则”的错误。

其三,姚名达先生认为《诗赋略》分为五种,但是“漫无区别”。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诗赋略》有总论而无叙论,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当时分类的依据和原因,且《诗赋略》各类当时所收之作品今大都亡佚,学者无法从作品内容进行研究,推测其分类含义,因此《诗赋略》分类之依据至今仍是谜。姚名达先生说其分类“漫无区别”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前人对《诗赋略》的分类依据也是有所研究的。章炳麟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对分类的依据推测为“《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健、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刘师培在《左盦集·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有云:“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原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世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5]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认为屈原赋之属,因荀卿有《云》《蚕》《箴》等赋,因而“盖主效物者也”。依以上学者的看法,《诗赋略》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作家作品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流派。当然对于这种提法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提出说辞,效物作标准来区别《诗赋略》的分类是解释不通的,并认为屈原赋中有《桔颂》,属效物一类,因而屈原赋不仅仅限于抒情,同时孙卿的作品也不仅仅限于抒情。^[17]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过于苛刻了,因为任何一部分分类法,在确定了一个分类标准以后就要严格按其来进行分类,这必然会忽略一本书的其它的特征。在《诗赋略》中屈原、陆贾、孙卿这三类是按时间先后分次作家姓氏和赋作数目的,而《杂赋》则是以题材及数目为序。正因为此,在前三类赋中都是按作家集中作品的,那么就难免会出现不是此类风格的作品入了此类。毕竟一位作家在一生中不会只写一种风格的作品,他总会有一些作品是其它风格的,可是评判一位作家的风格最终标准是他的主要作品为何种风格。如同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但在他的一生中也不乏《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样的婉约派作品。

其四,姚名达先生批评“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不能另立一种乎”,不知姚名达先生指的是立大类还是小类。如果是立大类的話,在刘歆那个年代将历史列为一大类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那个年代,历史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在先秦两汉时期史学或者说历史作品还是文史不分、子史结合的,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在分类法中,能够立大类的学科必须是理论基础深厚,发展成熟的学科,并且这个学科应该是由各个子学科构筑成的一个完整而又庞大的系统。显然当时的历史学发展状况是不满足列为一大类的条件的。至于列为小类,我认为“春秋”就应该视为是为历史著作而另立的类目,并不是说“附《国

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就是在“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国史学史中,史学家们向来就把《春秋》视为一本真正的史学著作。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史论著作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春秋》一书集事、文、义于一体,具备史学的因素,而《国语》《世本》《战国策》《左传》等史书是继《春秋》而产生。由此看来,说史书与《春秋》原为一家之学实不为过,归入一类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刘歆为何将这一小类称为“春秋”而非“史”,我认为这与语言的发展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有些词的词义缩小了,有些词的词义扩大了,有些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还有些词为新产生的词所代替而废弃不用。“史”这个字就属于随着语言的发展词义逐渐扩大的一类。“史”字原意是官名,即史官。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史,记事者也,从又(右手)执中;中,正也”。而史官是怎样一个职务呢?商周的史官并不是专职记事,而是首先担负着神职。至春秋时期史官仍有神职的特点,兼事人与神,清人汪中考证春秋时期的史官有“司天”“司神鬼”“司灾祥”“司卜巫”等职。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神的色彩才越来越弱,最后史与巫分家,形成真正的史学。^[6]如此考证推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歆称记录社会发展变迁、人事之代谢、总结吸取前代教训的书为“春秋”而非“史”了,更不会批评刘歆《七略》中不立史类。

其五,姚名达先生质疑“《诗赋》又何以自异于《诗经》”,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诗经》之于封建社会的作用以及古人对诗赋的观点来考究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则经学的主体儒家思想自然上升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根基和意识形态的化身,那么作为儒家经典之作的《诗经》地位也自然要被提高。虽然同为文学作品,但统治者认为《诗经》具有教化作用,既可以美化统治阶级,又可以对不良政治进行讽刺,所以《诗经》自然归入《六艺》类。^[18]至于同一时期的其他诗赋作品,古人是不重视的,因为在我国古代有一种重视立一家之言,轻视文词的思想,而汉辞赋家扬雄也视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植在《杨德祖书》中也曾表示,在建功立业方面,“若志未果,道不行,也希望能成一家之言”,而并不以自己能文章,工诗赋为满足。^[5]抱着这种轻诗赋的思想,刘歆怎么可能将《诗经》与《诗赋略》中的文章归于一类呢?如果将《诗赋略》中的诗赋附于《诗经》,那无疑是对《诗经》的贬低以及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正统的蔑视。

其六,姚名达先生认为“形法兼收地理、相人、相刀、相六畜之书一种”,“其为乘谬尤不待言”。何为“形法”?就是从形求其声气、贵贱、吉凶之方法。《汉书·艺文志》里列出的形法类所收之书有《山海经》《宫宅地形》《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等。后三种书收入形法类应不为怪,关键在于对《山海经》和《宫宅地形》这两本书的理解上。《宫宅地形》是一本看地形、风水的书,收入其中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何要将《山海经》也收入其内呢?这我们就要推究《山海经》与《宫宅地形》之间的学术渊源了。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与带有迷

●陈丽春 (浙江财经学院 图书馆, 杭州 310018)

电子图书的意义 与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偏差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高校办学条件;
数字资源; 电子图书; 图书馆评价指标

【摘要】论述了电子图书的意义, 分析了《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中存在的偏差, 以及这种偏差对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图分类号】G255.75; G25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07)02-0081-03

根据教育部教发(2004)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办学指标》), 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有5项指标, 其中一项为生均图书的指标, 规定综合、师范、民族、语言、财经、政法类院校的生均图书以达到100册为合格, 50册为限制招生, 同时规定电子图书在测算时不包括在内。^[1]诚然, 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是高校招生办学的前提, 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首要因素, 规定办学基本条件指标对于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 保证教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指标测定科学合理与否, 则会对实际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办学指标》在图书指标的测定中将电子图书排除在外, 有不够科学合理之嫌。

信色彩的相地术有密切的关系”。“《宫宅地形》可以说是古人在营造房子的过程中, 对周围地理环境、地理构造勘察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的总结。相地术通过看阴阳风水、山川形势来预卜吉凶祸福, 从秦汉开始, 便伴随地理学的发展而越来越神化”,^{[1][2]}玄之又玄。理解了相地术的由来及性质就不难理解为何《山海经》要与相地术同归入形法类。况且《山海经》虽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地理书, 但并非是什么科学著作, 其中还包括了许多神鬼故事, 鲁迅还曾斥其为迷信书著作。因此, 准确地说, 是姚名达先生将形法中的相地之书误作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地理书籍了。

【参考文献】

- [1] 高路明.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1 电子图书的意义

1.1 电子图书对于馆藏的意义

第一, 它能迅速优化图书馆馆藏文献结构。1999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由1998年的108.4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47.3万人。^[2]随着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 各院校的专业也在迅速拓展, 清华、北大、浙江大学等通过强强联合式的合并, 朝着世界综合性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其它院校也通过各种方式拓展专业面, 以适应办学规模的扩大。对于新的学科专业的文献信息保障, 最佳办法是通过购入电子资源补充馆藏, 以使馆藏文献结构迅速与学校学科专业结构相适应。第二, 补充馆藏图书复本。由于经费限制, 一般图书馆图书采购的复本为3-5本, 不少专业图书无法满足师生需求, 如计算机类图书, 学生需求量极大, 而图书价格又很高, 电子图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第三, 可以节约图书经费。目前, 纸质图书平均单价在每册30元左右, 而电子图书最贵的为5元一册, 最便宜的只有1元一册, 且无复本限制, 如40万元可以买40万种电子图书, 以3个复本计, 相当于120万册纸质藏书的文献信息量; 40万元也可以买10 000-15 000册左右的纸质图书, 对馆藏的贡献率孰大不言而喻。同时, 电子图书还有占用空间少, 保存成本低的特点, 因此, 电子图书大大降低了图书馆的图书

- [2] 严佐之. 《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 (汉) 班固. 汉书·艺文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997重印).
- [4] 王家范, 谢天佑. 中华古文明史辞典 [K].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5] 曹明纲. 赋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6] 施丁. 中国史学简史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作者简介】周涛, 毕业于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

【收稿日期】2005-03-05

【责任编辑】张京生